**从传统到现代**

**——基督教“罪”观在克尔凯郭尔处的转向**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基督教中“罪”的观念，特别聚焦于克尔凯郭尔的理解及其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中的转向。本文首先主要借助奥古斯丁对原罪的阐释介绍了关于罪的传统视点；之后深入分析克尔凯郭尔对“罪”的理解，主要关注罪的历史性以及罪与恐惧的关系。最后笔者试图探讨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后续影响，包括对辩证神学和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推动。通过对克尔凯郭尔“罪”之理解的研究，展现了现代基督教思想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对传统教义的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 克尔凯郭尔 基督教 罪 恐惧

基督教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其教义体系中的“罪”之观念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罪”即可概括为“罪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对上帝的反叛……罪就是人的生存处境”[[1]](#footnote-0)。从早期教会的神学思考到现代社会的宗教反思，“罪”的概念不断演变并适应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基督教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对“罪”的重新理解成为神学的关键课题。克尔凯郭尔作为基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对“罪”的独特见解成为了传统通向现代观念的桥梁，为现代基督教开辟了新方向。

1. **关于罪的传统视点**

**（一）原罪概念的起源**

探讨基督教之“罪”，不可避免的即是“原罪”这一关键概念：“由于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意志，这一罪过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所以称为‘原罪’。”[[2]](#footnote-1)它由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后经神学家奥古斯丁详细阐释，最终成为基督宗教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根据这一教义，由于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意志，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即“原罪”。亚当的堕落行为使得人类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有罪的状态，这种罪性通过遗传或某种神秘的方式传递给了每一个后代。

1. **奥古斯丁对罪的理解**

从原罪的本质方面，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首次说明了原罪，他认为罪是传承之罪，其来源是生育而非模仿。这意味着所有人类作为亚当的后代，从胚胎时期就已经带有了罪性。他强调“在他之中众人都犯了罪”[[3]](#footnote-2)（in whom all sinned），表明在亚当里罪传给了所有人。奥古斯丁的观点深刻影响了西方基督教对于人类罪性起源的理解，将罪恶根源追溯到了亚当的行为，从而构建一种基于遗传和历史传承的罪性理论。

从罪与恶的关系方面，罪产生于骄傲，表现为人从完美状态中堕落。奥古斯丁对于恶采取了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式的解释：“恶不是实体，而是属性，并且作为否定性的属性，恶与其说存在，不如说是存在的匮乏（缺如）。”[[4]](#footnote-3)上帝创造的世界本质上是善，但由于人类的堕落而导致善的缺失，从而产生恶。在《忏悔录》描述偷梨事件时，奥古斯丁剖析自身内心动机，“我也并不享受所偷的东西，不过是为了欣赏偷窃与罪恶”、“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5]](#footnote-4)。此事件体现了奥古斯丁对罪的理解：罪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违背了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人内心深处存在动机去违背上帝所赋予的善的本性。对罪的内在性和精神性的强调，成为了基督教传统中理解罪的重要维度。

1. **奥古斯丁之后：传统视点面临的挑战**

从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对“罪”的解释便面临两条肇始于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挑战：古典哲学的发展与现代性浪潮的冲击。首先古典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对基督教传统之“罪”观产生了冲击。康德的道德哲学强调人的自主性和理性的道德判断能力：“绝对的必然（上帝）不可能被经验所理解，也无法由知性所认知，对于根本不生成于现实经验中的东西，经验与知性又怎么能够把握它呢……当恶变成罪、从善成为赎罪，内在的自由向往固定化为外在的强制戒律时，世俗宗教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实现善的可能。”[[6]](#footnote-5)这与基督教强调的原罪和上帝的救赎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则强调历史的发展和理性的进步，对基督教基于超自然启示的教义解释提出了挑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绝对精神演进到世界历史表现为世界精神的发展,世界精神的发展是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同一。”[[7]](#footnote-6)而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似乎暗示了人类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堕落和无法自救的状态，这些矛盾都促使基督教哲学家必须回应传统“罪”观中存在的困难。

现代性浪潮的涌入更是使得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整体上与神学开始脱节。在个体的日常生活里，具体之人已替代神祗成为核心所在；在此情形之下，神学无奈要应对不断加剧的无神论危机。为“具体的人”提供支撑的是有关“人”而非“神”的探索研究，诸如生物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持续推进，促使人们尝试从人类自身的视角去剖析人性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不再仅仅凭借宗教教义来认知理解。“如马克斯・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便提出神学在解释‘人是以何种方式、从何处起源的’，而不是解释‘人是什么’，‘堕落’与‘罪孽’等词语仅仅是想要揭示人处于一种“与众不同”的状态中”[[8]](#footnote-7)。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基督教罪观念的权威性，基督教哲学家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解释和理解罪的概念。

1. **克尔凯郭尔对于“罪”的理解**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是丹麦神学家、哲学家、诗人、社会批评家和宗教作家，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生活于19世纪的丹麦，全球社会都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包括宗教信仰的动摇、启蒙思想的传播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克尔凯郭尔的人生经历促使他深入思考宗教、人性和存在的意义，其神学著作侧重于基督教伦理、教会制度、基督教纯粹客观证据之间的差异、人与神之间的无限质的区别，以及个人与神人耶稣基督的主观关系。

1. **罪的历史性**

克尔凯郭尔对于“罪”观理解的突破，首先来自他对于对传统原罪概念的批判。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在亚当身上的所见到的罪只是传承之罪……使得人类开始于一个不是个体的人的个体的人，这样人类和个体的人这两个概念都会被取消了。如果亚当之罪只是那原罪……使得历史这个概念就被取消，这就是说，那历史结束于它开始的那一瞬间。”[[9]](#footnote-8)他并不将“原罪”本身单纯理解为一种传承之罪，他认为“原罪”和传承之罪都是理解亚当原罪的一个方面。他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强调罪是通过一种历史性的维度进入世界的，亚当和人类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为了使历史得以发生，亚当身上的罪必须既是原罪又是传承之罪。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对原罪的静态理解，将罪置于历史的动态进程中，使基督教“罪”在回应历史性缺失的同时依然成为基督教内部贯穿人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虽然克尔凯郭尔在基督教哲学中引入历史维度明显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但他又在黑格尔的思想上进行了补充：他则将重点放在个体的存在和选择上。在罪的历史性问题上，克尔凯郭尔认为历史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发展过程，而是受到个体的具体行为和选择所影响，“在一种逻辑体系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说那可能性走向现实性，但是现实性中却并非那么容易，这之中还需要一种中介定性”[[10]](#footnote-9)。每个个体在面对罪的诱惑时，都要像亚当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个体的存在状态和与上帝的关系。亚当的堕落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每个个体在当下都可能面临的选择情境。当个体面临道德和信仰的抉择时，他们就如同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处境一样，必须在上帝的禁令和自身的欲望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实质上是超出了理性范畴的，因此是一种“眩晕”；一种“非存在的虚无”。这种对罪的历史性的理解，使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更加贴近个体的偶性生活，更关注个体在信仰和道德实践中的具体处境。

1. **罪与恐惧**

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也试图通过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反对古典哲学提供的思想立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要有一种教理神学的定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忘记黑格尔为帮助教理神学而发现的那些东西’为起始点”[[11]](#footnote-10)。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在克尔凯郭尔的认知里，上帝向亚当与夏娃下达的“你们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智慧果”这一禁令，实际上是在他们面前开启了一扇有关可能性的大门。两个相互映照的结果令他们置身于抉择的境地，而上帝所宣称的偷吃智慧果的后果——死亡，属于一种与生存全然相悖的存在形式，以有限的生存理性难以透彻理解。伊甸园之罪中，克尔凯郭尔暗合了传统基督教对罪的理解，即将是否吃下苹果看作是一种能力问题，亚当和夏娃因骄傲僭越上帝而犯罪。但他更进一步指出，伊甸园之罪不仅是关乎骄傲的能力问题，“不能”背后的无法理解使人类天然感受到恐惧的情感状态。这种对“乌有（不存在）”的恐惧态度，体现了对黑格尔式理性包容一切的哲学的反抗。在古典哲学中，理性被视为能够解释和把握一切存在的力量，但克尔凯郭尔通过对伊甸园故事的解读，强调了在面对超验上帝和未知死亡时理性的局限性，而恐惧成为了人类在情境下的本能反应。  
 站在哲学角度上，克尔凯郭尔在《恐惧的概念》中指出“恐惧”是作为“罪的后果”而存在的，而在《致死的病症》中，他进一步挖掘出了“罪”的本身形态——绝望。他认为，基督教意义上的罪是绝望被强化的产物，是个体的精神想要排除恐惧但却不能控制自我的结果。诞生罪的绝望是“绝望地不自觉到具有一个自我；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绝望地想要‘是自己’”[[12]](#footnote-11)。一个人可能陷入“无”中，想要逃离而忘记了自我的存在；因自身罪恶感或对上帝的敬畏，而不愿面对真实的自己，试图逃避自己的罪性；或是最后一种情况，个体过度追求自我实现，想要凭借自身力量成为完美存在，而忽略了上帝的存在和救赎。绝望的状态实际上是信仰的证明，因为绝望的人处于“对‘那宗教’炽烈的渴望之中”[[13]](#footnote-12)。个体虽然怀揣痛苦与怨恨想要超越最高者（上帝），但其本质上是确定最高者的存在。绝望的强化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提升，也是最高者在个人处显现程度的提升。“而唯有自我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意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时，这个体获得的才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自我，因而这自我乃在上帝面前有罪”[[14]](#footnote-13)。克尔凯郭尔通过对罪与恐惧、绝望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人类在信仰和道德追求中的复杂心理状态，在现代哲学图景下集中于个体在面对上帝时的精神挣扎和自我认知的处境，重新挽救基督教之“罪”的解释性。

1. **现代基督教哲学之滥觞：克尔凯郭尔的后续影响**
2. **辩证神学**

克尔凯郭尔对罪的理解为辩证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对理性在信仰中局限性的强调，与辩证神学的理念相契合：“在巴特处，‘辩证’首先意味人的思维的破碎性，这同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相关”[[15]](#footnote-14)。克尔凯郭尔认为在罪与上帝的关系中，人类常常处于一种悖论性的状态，理性的法则逐渐失效，在绝望中既想要摆脱又无法摆脱上帝的影响。悖论的心理状态为辩证神学提供了具体的思考案例，促使辩证神学家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在信仰过程中的否定与肯定、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亚当原罪的历史性解读，使辩证神学在思考上帝与人类历史关系时，更加注重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选择和信仰经历的悖论性。

**（二）基督教存在主义**

克尔凯郭尔被视为基督教存在主义的先驱，他对罪的理解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他的‘存在’思想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个人性……（他）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取得了“信仰境界”的理论资源，并承接了苏格拉底的‘绝望’与基督教唯信论的传统”[[16]](#footnote-15)。他对罪与恐惧、绝望关系的深刻剖析，突出了个体在信仰情境中的主观体验。个体在面对罪的恐惧和绝望时，所做出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行为，更是一种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寻。他强调个体在上帝面前的绝望状态是信仰的证明，这一观点促使基督教存在主义者更加关注个体在信仰危机中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成长。克尔凯郭尔对个体与上帝之间无限质的区别的强调，也为基督教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自由选择提供了思想资源。个体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必须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和选择来建立与上帝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外在的教会制度或传统教义的束缚。

1. **结语**

克尔凯郭尔对“罪”的理解在现代基督教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对罪的历史性的引入以及对罪与恐惧关系的独特阐释，既回应了古典哲学和现代性浪潮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挑战，又为后续的辩证神学和基督教存在主义等思想流派提供了启示。在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着各种道德和信仰困境，克尔凯郭尔的“罪”观提醒个体重新审视个体与上帝、罪与救赎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个体在信仰中的主观体验和自由选择，使得个体更加关注选择与内心精神；他对传统教义的革命性理解也为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适应性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基督教教义能够在现实历史变革的思想语境中保持其生命力。

1. 李勤丽：《罪与自我救赎》，武汉：湖北大学，2017年，第5-6页。 [↑](#footnote-ref-0)
2. 王毅、张宝英：《基督宗教“原罪”思想及其文化内涵》，《中国宗教》，2012年第6期，第62页。 [↑](#footnote-ref-1)
3. 王梓：《早期基督教中罪论的转变——论奥古斯丁对<罗马书>5:12的诠释》，《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5期，第59页。 [↑](#footnote-ref-2)
4. 孙小玲：《罪与自由：海德格尔与奥古斯丁》，《基督教学术》，2014年第2期，第47页。 [↑](#footnote-ref-3)
5.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30页。 [↑](#footnote-ref-4)
6. 张政文：《恶·罪·善——康德的人性与宗教关系理论解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33-34页。 [↑](#footnote-ref-5)
7. 崔淑兰：《黑格尔总体性思想批判：从克尔凯郭尔到福柯》，《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31页。 [↑](#footnote-ref-6)
8. [德]马克思·舍勒：《哲学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footnote-ref-7)
9. 崔硕、陈曼青：《克尔凯郭尔的罪论》，《理论观察》，2010年第3期，第19页。 [↑](#footnote-ref-8)
10. 崔硕、陈曼青：《克尔凯郭尔的罪论》，第20页。 [↑](#footnote-ref-9)
11. [丹麦]克尔凯郭尔：《畏惧与战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footnote-ref-10)
12. [丹麦]克尔凯郭尔：《畏惧与战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第419页。 [↑](#footnote-ref-11)
13. [丹麦]克尔凯郭尔：《畏惧与战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第498页。 [↑](#footnote-ref-12)
14. 崔硕、陈曼青：《克尔凯郭尔的罪论》，第20页。 [↑](#footnote-ref-13)
15. 田海华：《卡尔·巴特的神学思想》，《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页。 [↑](#footnote-ref-14)
16. 王至：《克尔凯郭尔存在美学的信仰内涵》，云南：云南民族大学，2023年，第II页。 [↑](#footnote-ref-15)